

2007
[衢州文史丛书]

南孔研究

衢州市政协文史委编

2007
中国戏剧出版社



序

孔 祥 楷

南宋定都临安，孔子第 48 世孙端友率族人精英随宋室南渡，并赐家于衢州，这对衢州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文化的交融等方面都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研究孔氏南宗，对于挖掘历史文化精华，丰富名城内涵，提高名城品位，塑造衢州形象，加快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工程。我承继孔氏南宗家庙奉祀官之职时，年少无知，难以构想此事，而后外出求学，接着相继在金矿和黄金学院就职，几十年间，也无暇顾及南孔的研究。1993 年应衢州市委、市政府的邀请，回衢州担任市长助理、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等职。在履行职责之余，组建了孔氏南宗研究会，得到一批有识之士的鼎力支持。他们秉承尊重儒学、弘扬南孔、振兴衢州的宗旨，利用业余时间搜集资料，撰写论文。这些文史爱好者的劳动成果，现由市政协文史委定名为《南孔研究》出版，此举无论是对衢州历史研究，还是对浙江文化大省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孔氏南宗历来注意资料的积累，编纂、保存和利用，怎奈日本侵略军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两度侵犯衢州，南宗孔府、孔庙惨遭轰炸、火焚和抢劫，绝大部分档案文献毁于一旦，使今日研究工作举步维艰。再者，自南宋以后，孔氏南宗后裔分迁衢境之外的有几十支，这些支派又有再分迁它地的。照理，南孔研究应涵盖衢境内外的各支孔氏南宗后裔，但因南孔研究会成立时间不长，组织联络事项未能全面展开，极缺各支派的研究文章，

使本集又留有缺憾。

孔子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儒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衢州既为孔氏大宗安家之地,且一度成为全国孔学中心,有许多宝贵的文化黄金封尘在历史中,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发现、去开采。但愿本书能为新的掘进奠定良好的开端。

目 录

孔氏的迁徙和中国文化中心的转移·····	陈定零(1)
衢州孔氏家庙及其文化内涵·····	崔铭先(9)
孔氏南宗史实辨正·····	徐寿昌(23)
孔氏南宗家庙奉祀官及其他·····	庄月江(51)
孔裔南迁与孔氏南宗家庙·····	孔柳先(59)
孔氏赐居衢州一说·····	陈定零(73)
孔氏南宗谱牒述略·····	刘国庆(75)
清末南宗孔府机构分析·····	唐 剑(80)
孔氏南宗家庙现存文物的特点及意义·····	徐雪莲(85)
坎宅离向开巽门	
——南宗孔府与家庙西轴线合用大门成因浅析·····	唐 剑(95)
孔氏南宗对衢州教育的影响·····	金召卫(98)
孔氏南宗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徐寿昌(104)
孔氏南宗不显与议·····	李吉安(121)
孔子文化在两部志书中的对比	
——读《曲阜市志》《衢州市志》·····	郑卫建(124)
唐宋《白孔六帖》版本考略·····	刘国庆(127)
读《孔氏南宗考略》杂谈·····	郑良安(134)
孔氏南宗与衢州的刻书业·····	郑卫建(142)
孔氏南宗家庙导游词之特色·····	徐雪莲(146)
家庙、孔庙与“祭之以礼”·····	郑良安(154)
研究孔氏南宗的珍贵史料·····	刘 炘(158)
衢州南宗孔府遗址发掘报告·····	柴福有(163)

孔氏南宗家庙·····	何钟永(184)
孔氏南宗庙会·····	汪筱联(190)
孔氏南宗大事记·····	刘国庆(194)

孔氏的迁徙和 中国文化中心的转移

陈 定 骞

在衢州谈历史文化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题目，不仅因为衢州是九十九座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且，全部中国文化无非是从孔子到毛泽东的历史展布。因为孔子的嫡裔长系在衢州，而江南毛氏也发源于衢州，全国再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这么贴近地来审视中国文化了。曲阜和韶山都只是单打冠军，我们可以搞双打，兼顾古代和现代，扩大视野来研究历史文化。

登高望远，才能有大手笔。中国读书人最有名的宣言是在岳阳楼写下的，因为岳阳楼雄峙江湖之间，以衔远山吞长江之势而号称三湘名胜。登斯楼也，目穷千里，心驰八极，往往能超越小我而升华到宠辱皆忘、天人合一的境地，真可以代天地而立言了。这个地方自从孟浩然写下“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豪言壮语，后来登楼的游客骚人，都击节称颂，甘拜下风。1044年，滕宗谅任岳阳知州，次年重修岳阳楼，并请他的好友范仲淹美言几句。范下了一番功夫，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在这篇佳构中，范氏不与孟浩然在写景上争一日之长，后人记得最牢的恐怕是与景物完全无涉的警句，也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范仲淹的笔下，什么湖光什么山色都统统被超越了，在这之上显示了一种恢宏的视野，具有穿透历史，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这就是中国读书人的理想、抱负和胸襟。

范仲淹的箴言，实际上 2500 多年前，孔子等先贤就已经身体力行了。那时，诸侯混战，礼崩乐坏，老百姓流离颠沛，备尝艰辛。而每当国家兴亡民族危难之际，总有一批热血的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犯难勇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春秋诸子为天下太平世界大同，劳筋骨饿肌肤而不悔，上下求索，左右寻源，擘划了不少救世良方，兴国长策。西方的思想家如埃及的祭司、印度的僧侣、希腊的哲人，生活都比较优裕，研究也比较超然。他们常常昂首问天，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是水？是土？是数？还是原子？古代西方的文化主要就是这样一种唯物的文明。东方的思想家通常都是农家子弟，活得很累，很难。他们往往更注意现实人生，在一个人和人常磕磕碰碰的世界里，他们常常扪心自问，人的本性是什么？是善？是恶？人和人如何自我节制，在一个有序的社会中更好相处？古代东方的文化主要就是这样一种伦理的文明。

有必要提及的是，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前，中国的学术就到了如此灿烂辉煌的程度，真让后人望尘莫及和汗颜羞愧。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孔子、荀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等哲学巨子，都闪亮登场。他们倡明学说，论辩得失，扶佐君王，实践理想，为天下读书人树立楷模，为千秋万代探寻福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又高出一筹，他们的核心思想为：主张建立以家族为蓝本的国家形式，以道德为轴心的行为准则，以文化为指归的价值体系。他们承认人、人、阶级和阶级的不平等，但是彼此之间不应互相仇视敌对，而应化解矛盾，寻求和谐相处方法，建设共同的大家庭。他们认为人人都应遵循社会礼法，以仁为本，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他们反对炫富恃贵，主张勤于学、耽于思、立于言、游于艺，把有限的生涯注于永恒的创造之中。

这种伦理文明植根于深厚的农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其一、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环境，受土壤、水文、气候等条件制约，“天”是高高在上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和生活资料房屋都是从祖上承继而来并还将遗传下去的。这也是原始社会禅让制度消亡的原因之一。如果耕有其田，如果天气帮忙，再加上手脚勤快，农民才能指望丰衣足食。所以，“天授祖传”、“敬天畏祖”、“勤劳致富”的观念特别深入人心。其二、农业生产涉及许多分工和合作关系，需要较大的生产组织，三世同堂、四世同堂，聚族而居的情况十分普遍。因田间劳作和不动产分配问题，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而不是以夫妻为中心的格局，也就是血缘超越情爱。并且，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处理父子女、兄弟妯娌、夫妻奴仆诸多关系，必需建立以长为尊的权威，以“和为贵”的最终结果，伦理因素也超越了法律关系。其三、农业生产是一种季节性劳动，春播秋收较忙，冬天有较长的农闲时间。我们看到古代的一些文学作品，像《诗经》，不仅内容上多写自然景象和人际关系，其作用也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像识字课本和常识教材。汉赋的堆叠也如此，古时主要也是当类书用的，因而常造成“洛阳纸贵”的情况。从各种记载和出土材料看，当时的富裕程度、工艺水平和学术繁荣都超乎想象，完全能过一种半耕半读的生活。孔子的儒家学派，尽管初意是维护贵族统治，孔子本人也有轻视稼穡的倾向，但其实际效果，就是为农民请命，为农民立说，既是农耕文明的结晶和升华，也体现了东方智慧的最高水平。

钱穆先生曾说过，东西方的学术和东西方的建筑差不多，西方的建筑是向上拓展空间的，东方的建筑却是平面布局的。孔子之所以是“千古一人”，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儒学的顶峰已经造就，以后的工作无非是维护补葺，或者是另辟新基再造别的殿堂。孔子之后约千年间，中国的文化中心就深深扎根于以曲

阜为轴心的黄河中下游那一片黄土地上。不羁的大河、无垠的平原和厚实的黄土高坡，蕴育了汉唐式的张扬、富强和磊落大方。蓝图已经绘就，汉唐两朝主要的功绩在国家机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学说在理论上没什么建树，有点类似谶纬学，他的贡献主要是在实践层面上的，是为统治阶级作舆论准备和理论依据的。而后，汉代帝王“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们以王权代替神权，黄河流域相对较差的自然环境，要求中国人更多的务实精神，因此中国只有地上的权威，天上的世界只是实际世界的微弱的倒映；他们实行中央集权郡县制的文治，代替贵族式、军阀式的分封割据的人治，尤其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不仅使兵农合一，也使士农合一，以考试代替世袭，虽比不上普选制那么伟大，但和世袭或推荐制相比，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他们采用重农抑商温饱小康式的经济模式，使富不敌国，贫有所养，并使富和贵相对分离；他们强调文以载道的文化类型，文学成了启蒙课本、应用教材、历史记载和田园诗歌，成了稼和穡之外的重要消遣。孔子的理想构图，经过汉唐数百年的具体实施，已使中国成了农耕文明建筑的世界最强国。

然而，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过分强调社会群体价值，政治第一，唯上唯官，极大地压缩了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间，严重地扭曲了个人的心灵世界。对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兼济”无门，为帝王师几乎等于痴人说梦，所以更多的功夫是如何“独善”。作为对人性压抑的反弹，期间也产生魏晋玄学，与道家的修身养性、自我超越融成一体，成为文化人发掘自我价值、回归自然的另类生活取向。把盩西厢、艺菊南山成了消磨时光和豪性的现实途径。兼之汉末政局动乱，兵连祸结，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从西域传来的佛教，由于更关注平民生活，以慈悲为怀的虔诚，普渡众生的气度，倡扬因果报应的学说和积德行善的行为，被普通百姓所广泛接受，其影响甚至大大超越了儒学的说教。

一时间，跋山涉水，横绝大漠，求法译经，蔚为风气。人生也因信仰而有所寄托，有所希望，有所奔头，有所慰藉。而许多读书人也兼收并蓄，对社会取儒学态度，对自我取佛徒观念，对心灵取道家主义，像国画一样，取多视点的人生观照。

有位老先生说，东半球的气候，决定着中国历史的变迁。当进入一个寒冷周期时，天苍苍野茫茫的北方高原，草枯羊死，大批游牧民族为了生存，金戈铁马，蜂拥向南，抢掠农民的粮食和财物。华北平原首当其冲，成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厮杀的大战场。匈奴、鲜卑、突厥、辽、金、蒙古等相继侵扰中原，尤其宋代以后，汉民族的重心不断南移，终于突破长江，向阳光更灿烂的南方拓展。不胜战争之扰的孔氏高层，也随宋代的高宗皇帝南渡，暂时栖居于钱江上游的衢州，谁知一住就是八百多年，而后中国中古文化的中心，竟落在了以衢州为轴心的东南地区。这里，地属东南丘陵，山不高而名，水不深而灵。往往一邑之内，山地、丘陵、平原俱有，大米、杂粮、果蔬、山货齐备，具有相当的自足性和封闭性，甚至各自还形成独特的物产、工艺、语言、风俗。这个由许许多多“独立王国”组成的大区域，蕴育不了多少大气磅礴之君和老谋深算之臣，但尚具有百越先民之余绪，多孤峭执拗之士。当国家危难之际，王安石变法革新、文天祥弃笔从戎、方孝孺毁家赴难、林则徐拍案而起、鲁迅横眉冷对，在他们身上显示了南人固有的蛮劲野性。也正是倚靠东南的形胜、富庶和英才，才使赵构得以喘息苟且一方，使朱元璋得以凭借扫平天下。

如果说先秦诸子的贡献在学术争鸣，汉唐两朝的成就在制度和社会建设，那么，宋明理学则侧重个人的行为规范。游牧文明的冲击，道教、佛学的流行，东南地区的开辟，都需要对孔子创建的儒学大厦作较大的补葺整修。周敦颐、邵雍、张载、两程导夫先路，到南宋朱熹以儒为宗，融汇扬弃释道，建立了以天理为主体的宇宙观，以太极阴阳为演变的物理学，以格物为过程的认

识论，以致知为目的的实践说，以三纲五常为指归的伦理标准。把孔子语录式的智慧，包装成体大虑精的宏大学说。而后陆九渊、王阳明在朱熹学说补充物“理”、道“理”之外，又强调了心“理”的方面。其实质在融汇之外，重在忧国忧民，反省异族入侵带来的败局。本来，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但是科学制度只能保证前者，从仕之后往往走上贪鄙一路，误国误民，害莫大焉。理学家以“存天理，灭人欲”来重申孔子的“克己复礼”主张，也可见理学之士破釜沉舟的决心。朱熹如是主张，也如是实行，他在衢州就有弹劾贪官之举。当然，后来统治者利用理学未流，用其学说一意禁锢思想，专门修理妇女，则又当别论。

而当孔氏让爵曲阜之后，南北之间仿佛拔河比赛，中国的文化中心又逐渐渐往北移挪，约四百年后，最终定位于衢州与曲阜间的长江三角洲一带，也即所谓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区。在此，长江的浩荡，东海的恣肆，全细分作了河网交错、阡陌纵横的小格局，西湖十景、秦淮八艳的细结裹。小农经济精耕细作造就了一种富而不强，秀而不扬文化场面。如果没有外界干扰，这种瓷般脆丝样薄的精细文化，也不知还要绵延多久。有清一代，一些读书人曾深感亡国之痛，反思空谈心性无补于世，或周游郡县，或躲避深山，企图以学问扶危济难，经世致用。一些读书人如黄宗羲之流，甚至已经意识到中国根本的弊端，在于专权帝制的危害。他痛斥帝皇“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为一人之淫乐”。他主张建立以宰相为政府首脑的内阁制，以学校为清议监督机构的“议会”制。他提倡法治观念，承认私有财产的合理性，还研究税收问题，阐述“工商皆本”的思想。黄宗羲的思想，植根于东南地区工商贸易的繁盛，也是对农耕文明的沉痛反思和大胆反拨。但在大兴文字狱面前，读书人终于乖乖就范，钻入训诂考证的语言层面，功夫越下越深，学问越做越细，学术也越来越向自我回归。如果说中国早期文化致力于宗教化的

政治，政治化的伦理，伦理化的艺术，那么，到晚期以后，才比较普遍地实现了艺术化的人生这样的美满结穴。士大夫和社会上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平头百姓也常平和而聪敏，虽出不了帝王将帅那样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每科状元，大半被江南囊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指南》透露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直到今天，江浙在人才上还占优势，如54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102位籍贯是江苏，91位院士的籍贯是浙江，总和超过三分之一还强。

文化的价值是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紧密相关的，而且呈几何式关系，国家兴盛时，一幅画、一本书、一口碗、一个盘值到几万几百万。国家衰亡时，什么文化艺术也不值钱，善本名帖珍宝古玩统统换不了几斤大米。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西洋的坚船利炮和鸦片洋布开始危及大清帝国的生存，这时候文化自然大大贬值。我们的三坟五典、我们的唐诗宋词，根本无法抵御侵略者的贪婪、野心和炮火，美仑美奂的圆明园被毁，包罗万象的《永乐大典》被焚。文化到底能保家卫国还是能疗饥果腹？连埋头故纸堆中的读书人也不安生了，他们公开上书，他们变法维新，他们上街示威，他们喋血疆场，他们呼吁科学和民主。大家回过头来反思，反而觉得真是文化害人，是我们的故纸堆误事，所谓“儒冠多误身”吧。所以世纪之初，读书人自己跳将出来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检讨文言文的弊端，还差点把方块汉字改成拉丁拼音。胡适、鲁迅、钱穆分别从欧美、俄国和中国传统中汲取经验，代表了西化的、批判的和重建的三种态度和取向。由于时局多乱，文化的声音很弱，重建的力量更小。上世纪前五十年基本上是一种为生存的文化，“独善”而不得，更遑论“兼济”，与鸦片战争以来读书人的忧患愤发是一脉相承的。

闹到上世纪中叶，随着北宗奉祀官孔德成浮桴海岛，中国文化中心也有向边缘发散的趋向。太平洋西岸的岛弧和半岛地带，成了新儒学的温床，这种边缘文化是中西合璧式的杂烩，又

染上了浓郁的海洋文明色彩,形成多元开放的格局。碧海蓝天间耸起高楼大厦,椰风蕉雨中透出灯红酒绿。而在大陆,由于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多重挤压,传统文化被否定之否定,反而以一种压抑的形式走向极端,并得到因工业文明崛起而退处社会底层的农民的支持,也较迎合那种长期受压迫或嫉妒所致的暴力倾向和复仇心态。农耕文明不甘于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中心的地位,逆世界潮流而动,顽固到与现代文明分庭抗礼,用激烈的方式重新整合了社会结构的社会关系。要使文化上升到应有位置,恐怕还有待政治、经济的进步。

孔氏是中国的第一家族,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建立强权的,只能煊赫一时;创造文化的,终将受亿万斯民永恒的景仰膜拜。孔氏的迁徙竟然影响到中国文化中心的转移,这也说明读书人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和载体,读书人的“万世师表”孔子及其后裔的所在,也是天下读书人景仰的圣地和向学的轴心。如孔氏南迁衢州时,朱熹的闽学、两陆的心学和吕祖谦为首的浙东学派,都如众星拱月般围绕在衢州左近。另一方面,中国读书人的命运,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命运,毋宁说,还是国家的命运。在知识经济愈益重要的今天,读书人除继续完善小我之外,还应如孔子一样代天地而立言,如范仲淹一样忧国忧民,如无数先进一样砥柱中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率领着风气的转捩。以孔子为象征的儒家学说,既植根于农耕文明,具有这一文明全部的特征和局限,又有超越自身跨时代的价值,在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彰明其内涵,修正其外延,尤为重要。

衢州孔氏家庙及其文化内涵

崔 铭 先

一

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为讨伐福建耿精忠叛乱而率十万之众驻扎衢州多年的兵部尚书李之芳在《重修孔氏家庙碑》中写道:“自唐开元后,郡邑皆立孔子庙,有司岁时奉祠,至今不废。而为孔氏之家庙者,遍行天下,唯曲阜与衢州耳。”

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之后,“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皇帝诏郡县祀圣师周公、孔子于学,孔子被推向全国。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鲁相韩敕以官钱修葺曲阜孔庙。自此开始,孔子所居宅堂之庙逐渐变成了官设的祀孔子的庙堂。可见,曲阜孔庙是因孔子后代及其弟子、乡邻祀孔子而起,后来逐渐变为皇帝、官僚祀孔子之处,延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庙。

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诏令州县立孔子庙,奉祀孔子木主。同时,还令兖州建阙里孔子庙,从而使曲阜的孔庙规格升高。由地方官的关注之处变成了皇帝亲自关注之所。以后的历代帝王又不惜重金,不断地修饰营造,使曲阜孔庙的规模越

来越大。

孔庙实际上已成了皇室祭孔之所。自汉武帝以后的两千年来,凡是太平岁月,历代帝王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局面,他们必然地要求用孔子的思想作为封建大厦的梁柱。他们必然地尊崇孔子,崇尚儒学。一方面,他们对孔子褒封加谥,使之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庙中孔子像也是一派帝王气象:执锁圭、冕十二旒、服十二章,祭用太牢。一方面,他们给孔氏宗子封官进爵。另一方面,则是无限制地扩充孔庙。他们有的亲至曲阜祀祭,有的遣官致祭,使曲阜孔庙成了皇家祭孔尊儒的场所。历代帝王到了孔夫子灵前也必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以表达对至圣先师的崇敬虔诚。实际上,曲阜孔庙已经演变成儒家思想在整个封建时代所占据地位的物化象征。

曲阜孔庙已成了官庙,这已毋庸置疑了。然而,到过曲阜的人自然知道,曲阜孔庙之东还有一座庙,那就是曲阜孔氏家庙。孔子辞世之后,起初是以宅为庙,这实际上就是家庙。在孔庙成为官设的富丽堂皇的庙堂之后,最迟在宋代,遵照孔子“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教导,孔氏嫡裔依然保留着孔氏家庙,作为孔氏宗子家祭先祖的专祠。现在的曲阜孔氏家庙重建于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据《山东省志·孔子故里志》记载,家庙“面阔7间,进深3间,灰瓦绿边硬山顶,雅伍墨彩画;木架为七檩四柱前后廊式;前为廊,不设斗拱,脊桁下以叉手支撑,梁枋瘦巧。院前三门,砖墙承重,均为灰瓦硬山顶。家庙建成后,仍供奉孔子夫妇、孔鲤夫妇、孔伋夫妇及四十三代孔仁玉中心祖”。

可见,曲阜有两庙,一是名称显赫之孔庙;二是知者甚寡之家庙。前者是皇家祭孔之所,后者是宗子祭祖之处。两庙分设,各有自己的作用。

衢州之庙是孔氏家庙。

衢州之家庙是因为宋朝皇室的南迁。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兵陷汴京,掳走徽宗、钦宗二帝,北宋亡。同年五月,赵构在应天(河南商丘)称帝,为高宗,改元建炎。此为南宋之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秋,宋高宗在扬州行官举行郊祀,诏远在曲阜的孔子48代孙衍圣公孔端友等侍祀。这时,金兵分三路向山东、河南、陕西进发。取道山东的一路,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春初攻下徐州,进而南下,直指扬州。宋高宗皇廷仓皇至杭。孔端友已无法回到被金兵统治的曲阜,亦只好随宋高宗南渡。同年九月,金兀术分兵两路过长江,破建康,进逼杭州。宋高宗只好携众往浙东逃窜,直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春金兵北撤,才返回杭州。此后,宋高宗赐孔氏宗子寓衢,“权以州学为家庙”。从此时起,孔氏宗子一脉就在衢州生息繁衍。起初,家庙“时尚草创,即庠为家庙,酌田供礼,未有定数”(家庙《碑记》)。到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宋高宗颁赐铜印,赐田五顷,以供族人祀祭。孔氏南迁者才逐渐安定了下来。

孔氏衢州家庙建立以来的八百多年间,数易其址。

先是“权以州学为家庙”。但是,这个“权以”,却拖到一百多年后的南宗宝祐年间才兴建了新的家庙。当时,衢州知州孙子秀奏请建庙,宋理宗因北伐无望,中原难回,就准了孙子秀的奏本。孙子秀奉皇命“得地于城之东北陬浮屠氏废庐,撤而宫之。杭平湖以象洙泗,面龟峰以想东山。对庙门而中为玄圣殿,西则齐鲁、后则郛国,祠沂泗二侯于庑之东西,又别为室以祠袭封之得祠者。后为堂曰思鲁,俾之合族讲学,且以志不忘阙里之旧也。堂之东亭曰咏春,以憩四方之士仰止高山低回而不能去者。为屋二百二十有五楹。经始于宝祐癸丑(元年,公元1253年)仲

夏，落成于次年仲春朔”。这一最早的衢州孔氏家庙“仿曲阜之制，追鲁庙之遗，栋宇巍然，丹碧一新。岂独使承祭者裸献尽礼，观瞻如在，暨今过者如式宫墙，入者如升丝竹之堂，息者如风乎舞雩。水光涟漪，上接天碧；林薄蔽云，远接城市；鱼鸟飞跃，消体森然，春沂杏坛气象可想，不亦伟乎”。这是当时的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国史实录修撰赵汝腾所记。可见，最初的衢州孔氏家庙是以曲阜之官办孔庙为本而建的。然而，最多也只是过了三五十年的时间，至宋末，此庙即以兵乱而毁。

宋末元初，孔子 53 代嫡长孙衍圣公孔洙将家庙迁建城南，但已没有宝祐家庙的规模了。后因孔洙让爵于曲阜的族弟孔治，免税的祭田也变为纳官粮之田，孔氏已无力修葺，城南的孔氏家庙即逐年损毁。

《明史·文苑传》中记载：“弘治十八年（公元 1505 年），衢州知府沈杰奏言：衢州圣庙自孔洙让爵之后，衣冠礼仪猥同氓庶。今访得洙之六世孙彦绳，请授以官，俾主祀事。又言其先世祭田，洪武初轻则起科，后改征重税，请仍改轻，以供祀费。帝可之。正德元年（公元 1506 年），授彦绳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并减其祭田之税”。正德十五年（公元 1520 年），明武宗朱厚照允许动用库银重建衢州孔氏家庙于今址。经明、清两朝的多次修葺扩充，衢州孔氏家庙又有了相当的规模。

八百多年来，衢州孔氏家庙几经变迁，屋舍可多可少，可新可旧，可简可繁，但从未减弱衢州孔氏对家庙的崇拜，从未省去孔氏家族对孔子的祀祭。庙内的大成殿、崇圣祠、圣泽楼、独有的思鲁阁，以及庙外的“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两坊等等，也从未减去。正如明正德年间谢迁所言：“衢之子孙其尚礼易革之义，孚利用以格祖考。则是庙也，亦犹夫鲁也”。